

我推测小时候说的是北方话。因为，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。弄堂里的人，叫奶奶为山东老奶奶，叫我们为小山东。那时的上海人，以为中国北方都是山东，过了山东就是东北。

奶奶是河北保定人，虽不识字，小脚，但出身乡绅之家，善良好客，特讲礼数，富传统教养。我和小学同学50年没见面，第一次见面，凡是当年到过我家的同学，第一句都是：我记得，你家有个老奶奶，老好的。

我哥哥比我大一岁，他上小学后学普通话，渐渐地就觉得奶奶说话与学校老师说话不一样，渐渐地又判断出是奶奶说话不标准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奶奶说的是土话。我记得奶奶听哥哥这么说很是生气，骂哥哥：祖祖辈辈都这么说话，你嫌奶奶说话土？

小兔崽子，丧良心了。这时我也上小学了，开始懂事了，觉得哥哥说得对，站在哥哥一边。结果也属于“丧良心”一类。比如，妹妹很小的时候，奶奶哄她玩一种北方游戏，特简单，就是用两个食指一边对点，一边说：du、du、du、飞——当说到拉长声调的“飞”时，

奶奶的土话

李 瑾

两个手就张开了。我们认为，这个du就是土话。

实际上，奶奶是对过的，我们是错的。新华字典是有这个du字的：馐。其含义就是“轻轻地点”。鲁迅先生早就说过：人生识字糊涂始。我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：当自以为懂了的时候，说不定是不懂的开始。奶奶有些话，如：矫情、显摆、得瑟……现在都是时髦用语。时代证明，奶奶说的话是很超前的。

我们最早发现是自己错，不是奶奶错的时候，是在停课之后，开始阅读《烈火金刚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

道》等小说。尤其是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，这个古城就是我们保定，哥哥首先发现，奶奶说的话，书里都有。比如：墙杳晃（墙角）、倒磨子（自言自语）、气拍拍（气鼓鼓的样子）、大晌午的（在这之前，我以为奶奶说的是“大上午的”）……

至于我，还有更大的错误。当我认识到奶奶的语言是文学语言之后，就开始在写作中，学着运用奶奶的语言。但是，我往往写错或者读错奶奶说的字。比如：奶奶说：丢三la四。我写成：丢三拉四。实际应该是：丢三落四。当我在文章里读“丢三落四”时，却读成：丢三luo四。我根本不知道：这个“落”就是我以为的“拉”。奶奶说：wai鼻子斜眼的。我写成：嘴眼歪斜。实际应该是“另鼻子”。这个“另”，我一看见，就想念成“锅”。

奶奶很注重养成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她教我们做家务：家里要经常拾duo（掇）拾duo（掇），拿着ma布到处mama（这个ma，我还以为是加个扌的麻。实际是“抹”，但我见到“抹”，读成mo）。自己动手，Huo面，包饺子。这个huo，就是“和”。

“约了几斤面回来包饺子。”当我在小说中读到这句话很不理解。“约



请面粉回家”？查了字典才明白，这个“约”在此地念yao。就是上海人说的：称（份量）。我立刻想起，奶奶经常说：去，到菜场，yao它几个……去，到粮店，yao它几斤……原来是这么写呀：约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比较注意字典中标有（方）的字。我读到“脖颈”时，不会把“颈”念成jing，我知道应该念geng。我看到“别扭”，知道这个niu应该写成“拗”。我写到“ou气”，我不会把ou写成“呕”，应该是“怄”。奶奶是一座语言宝库，我从奶奶那学到许多。

很久以来，每当我读到那些奶奶说过的词语，我就想起奶奶。就觉得奶奶还在床头，戴着老花镜，为我们补衣服，补袜子，纳鞋底。小时候，我贪玩，甚至早上出溜出去，奶奶不在院子叫我吃饭就睡不着家。奶奶就对我们说：一个人将来想出息，打亲小就要好念书。没见过你们这样贪玩的。

我现在六十岁了，天天在读书，不是为了出息，而是为了有奶奶在身边的感觉。



怀抱琵琶

管咏梅 作

以传统的篆刻批评标准来看，这枚印章还算不上是篆刻作品，但是比起如今充斥字内的离经叛道的“篆刻作品”，它却还算是接近篆刻作品的一枚印章。虽然，篆法章法刀法俱乏善可陈。

“宗英”者，黄宗英女士；刻者“阿丹”，是我青少年时代纵横天下的电影一哥赵丹前辈。大约三十五年前，宗英前辈委我编拓印谱《赵丹遗印》，出示了这一颗充满情感的纪念品。

听说赵前辈年轻时，在海粟刘老师的美术学校学过画。后来在电影界大放异彩，无暇顾及，遂放弃绘画爱好。一直到“文革”被打倒，才又拾起画笔，以解寂寥。偶尔，也会刻个印章。这颗“宗英藏书”（图一）便是那个时代刻赠爱妻的。当宗英前辈把这颗印章交给我钐拓时，眼里闪着泪花，却满是爱意。

赵丹前辈逝于一九八零年。虽然被有些人讥为临死还放了一泡空气，老百姓倒是挺怀念这位人民演员的。上海作协的魏绍昌先生，是赵前辈夫妇的挚友，嗜印，《古巴谚语印谱》、《养猪印谱》就是他张罗的。他向赵夫人黄宗英提议制作《赵丹遗印》，并推荐我担当之。

赵前辈遗下的印章虽有七八十颗之多，内中且有钱君匋、方去疾老师以及王个簣、方介堪先生和陆康、衍方兄的佳制，但多为无名辈荒芜气象。

我从淮海中路赵宅把印章取来，洗净挑选，取佳者及尚可一观者，编拓成谱。那时，周璇前辈的息子周伟还住在赵家，因为很近，还骑车到寒舍兴致勃勃看我钐拓。不意后来和宗英前辈打起官司，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。

这批印章中，有颗“赵”一字印（图二），无款，石质极普通。宗英前辈说是赵丹自刻且非常喜欢的。我便在印侧刻了“丹翁自作，茗屋补记”，放在印谱的第一页。

这方“宗英藏书”，原先我也打算附于谱后，但黄前辈不愿意，说谱中全是“遗”印，“我还活着呢”。尊重她的意见，没有入谱。

“文革”前，赵丹黄宗英前辈住在湖南路。我倒一次也未去过。“文革”中赵前辈被放出闲置，安排住入了淮海路上造反英雄陈阿大被逐出的房子。他在那里，每天画画度日。要我刻过“画疯子”的印，还画过一幅瓶梅图送我。他走了以后，白杨前辈题诗于上：莫道梅花喜气融，斑斑血染泣丹翁；神飞劲笔乘风去，空余唏嘘画幅中。

现在，他们湖南路的旧居前，竖有铜牌说明之。那一带，小洋房林立，有许多名人故居，时不时有挂着照相机的探客徜徉林荫道上。见到铜牌上“赵丹”二字的年轻人，大多现茫然之色。稍有一点社会经历的，则顿现欣喜，向旁人津津乐道。是啊，演员是公众人物，名字容易被记住。优秀演员饰演过的角色，更会给人留下印象，乃至永远。在区区的记忆中，李默然的邓世昌；陈晓旭的林黛玉；游本昌的济公；刘涛的阿朱，还有赵丹的武训，俱已成为永恒。

宗英藏书

陈茗屋

《赵丹遗印》的序言是请黄宗英前辈撰写的。她是文坛圣手，文笔好，感情真——

赵丹印，我是很熟悉的。赵丹遗印，我还很陌生。这些图章，昔日散放在他的抽屉里、行囊中时，除了行家有兴趣欣赏几方名章外，就谁也不注意。赵丹每成一幅字画后，常常几天里琢磨来，琢磨去，审度该用哪一方图章，打在哪一角落的神情，还在眼前。或友人围着他笔酣墨饱印泥红，抖擞精神一气呵成，起印时自己叫一声好，这气势也邈然在目。究竟，究竟怎么出来个遗字？我久久地盯着那个遗字，仿佛过去并不认识它。遗，竟是走字与贵字组成。诚然乎？竟然乎？噫，憾然序此赵丹生前所用金石之谱，记其金石之志，不忘金石之言，不负金石之约。赵丹之妻黄宗英志。赵丹之子赵佑敬书。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赵丹逝世周年祭。



后记是区所撰——

丹翁谢世以后，我应宗英先生命，整理了丹翁留在家里的全部印章，并选出六十六颗常用者拓成此谱。丹翁是蜚声海内外的电影艺术大师，也是位直抒怀抱的中国画家。我们从他喜爱的印章中可以清楚地味出他的艺术观。尤其是那些闲章，则更是他的思想的反映。所以，这部印谱对赵丹研究者是极为珍贵的权威资料。

是谱原计划在今年春天完成，故卷末牌记作“一九八一年春”。后来由于宗英先生出国访问，须等她回来作序，所以延至今日才合装成册。不过，也正可作为丹翁逝世一周年的纪念。

是谱共拓三部：一号书归宗英先生；二号书存留在我的手头；三号书为魏绍昌先生所珍护。另外，还有一部工作稿本。一九八一年十月茗屋记于上海。

『定于一』

白子超

孟子见梁襄王。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……”

——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

梁惠王见孟子后，第二年去世，其子继位，为梁襄王。孟子与梁襄王对话，全书只此一段，本文所引为前半部分。用现代汉语表述其大意：孟子谒见梁襄王。出来以后，告诉人说：“远处看他，不像个国君的样子；走近了，也看不到让人敬畏的地方。他突然发问：‘天下怎样才能安定？’我回答：‘只能安定于王道。’他又问：‘谁能统一天下呢？’我说：‘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够统一天下。’”

令人醒目的是“定于一”。“一”在此应是名词，“一统天下”之义。当时的情况是周王朝早已名存实亡，七个大国各自为政，各怀野心，争战不断，造成天下大乱。说“定于一”反映了孟子关于国家的统一思想，毫无问题。问题在于，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主张统一，而尤以法家为显著，那么孟子与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倘若真正理解了孟子，则可知他的“一”必是指“王道”。就是说，只有实行“王道”，天下才能安定。与此相反，法家的“一”是“霸道”。关于“霸道”，将在后文加以说明。

梁襄王仅将“一”理解为动词“统一”，且连接到现实或未来的个人身上，问出“孰能一之”。单从语言文字角度看，不能说梁襄王错，但他不可能洞悉孟子语言背后的深意。孟子对只注重现实利益的梁襄王未作解释，只是话接话，顺势引导而已。

孟子死后不足百年，秦国以霸道的武力统一了天下，似乎宣告了孟子“定于一”的不实。然而，秦始皇、秦二世都是“嗜杀人者”，统一的大秦帝国并不安定，很快就被新王朝所取代，又从反面证明“定于一”自有其道理在。今人对“定于一”作历史的、辩证的分析，必然会看到其理想主义的两面。一面是高瞻远瞩、着眼美好的光辉，一面是夸夸而谈、超越现实的虚空。必须承认，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其理想主义的光明面是主流，永远具有信仰的力量。

这段文字令人感兴趣的，还有“望之不似人君”。此语之所以成为孟子诸多名言之一，大概是因为它开创了中国人“看相”的先河。根据人的面貌、五官、气色、骨骼等，来推算人的吉凶、福祸、贵贱、寿夭等，确有迷信。但是，科学与实践均可证明，人的品质、胸襟、性格，常人在人的外在形态包括眼神、表情、举止、言谈中透露一二。故对所谓“相术”亦当一分为二。既然孟子说梁襄王不像个国君，没有威严，那么人们尽可以想象其相貌、身姿、气度之不佳。

讲一则相关的闲话。故宫博物院和庐山天池寺各藏有一幅朱元璋的画像，两张差异很大。有人认为，传说朱元璋相貌似猪，而故宫那幅与猪相甚远，因而是假的。南怀瑾先生说，他亲眼见过天池寺那幅画像，确像猪头，五岳朝天，嘴唇特厚。先生认为，朱元璋不可能那么像猪，故宫那幅是真的才对。两幅画像都“望之不似人君”，但像主都是明朝开国皇帝。所以，“人不可貌相”一说亦能成立。总之，看问题不可简单化、片面化、绝对化。



孟子选读

沪上京剧票房星罗棋布，而以著名专业京剧表演艺术家为掌门人的却鲜见，君子兰京剧传习社就是一家。社长和副社长分别是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达发和金锡华。

君子兰京剧传习社成立于2001年，原名青之杰京剧传习社，至今已走过整整15个年头。担任该社顾问的是李蔷华、舒昌玉（梅兰芳入室弟子）、李炳淑、夏慧华、周少麟、尤继舜等六位京剧名家。乐队成员也大多是业内大腕。琴师是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尤继舜。梨园界赞京胡名家有“南尤北燕”之说，“北燕”是指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燕守平，“南尤”即指尤继舜。操琴的还有一位青年琴师中的佼佼者陈平一。鼓师金正明和钱镇威也是赫赫有名的。打大锣的是全国有名的锣王钱根生，他家住苏州，每次活动都专程从苏州坐高铁赶来。除了一流的乐队，还有一流的音响。活动场地在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宽阔敞亮的大厅内，在上海市中心有如此票戏之地，也是一流的了。常来光顾票房的还有影视演员张达发，老报人秦绿枝等。每周日下午从1点半活动到6点，从未停息。

这个有点小众的票房人员相处融洽，名为君子兰，寓意“君子来”。15年来，票房发生过无数感人故事，金锡华说起来如数家珍。周信芳之子周少麟从君子兰成立那天起，几乎每次都来。后来，他因患帕金森症，走路不方便。票房原先在卢湾体育馆二楼，每次都是由票房的一位年轻人把他背上楼来。他唱不动了，但喜欢打大锣，钱师傅就让他打，打出的锣虽然有气无力，但依旧得到大家的热情鼓励。滑稽名家杨华生也是君子兰票房的会员，他喜欢唱京剧，但因耳背导致耳音不准，每次大家就一起帮他找调门，找对后，就叮嘱他“千万记住了”。杨老每次都唱得兴致勃勃，欲罢不能。香港会员汪可强晚年因病住在上海的医院里。一次，票房活动时，原先前面不开的那扇门突然被打开了，众人正在纳闷，却发现汪先生坐着轮椅由他女儿从门内推了出来，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汪先生当场唱了《浣纱记》中伍子胥的一段“二六”，琴师把音调到最低。其实，当时他已病入膏肓，回到香港不久就仙逝了。这一段“二六”就此成了汪先生的绝唱。著名评弹演员潘荫荫也是票房会员，他夫人说，他退休后最盼望的是每周一次的君子兰票房活动。他每次只唱一小段，大家最爱听他唱《三家店》流水中的一句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，听上去又软又糯。潘先生说我不是来唱的，坐着听听就很开心了。潘先生生病住院期间，还不忘一再关照老伴，票房会费不要忘记去付掉。潘先生嗜茶，每年清明前都要到苏州东山去买5000元一斤的碧螺春，拿到票房让大家喝。潘先生仙逝后，他留下的碧螺春还在，大家端起茶杯，就会想起潘先生的音容笑貌。

今年已届75岁高龄的金锡华对于票房有一份情结。他出生于北京，父亲是昔日京城票界四大名丑之一。金锡华从小就跟着父亲在票房玩。他说：“君子兰票房早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”。他和张达发为了票房鞍前马后，几乎所有的星期日都贡献在这里，却分文不取。现在，金锡华把他的爱徒康伟也“拉”了进来，以保证君子兰京剧传习社的可持续发展。

弘扬社是有海内外票友组成的票社。

京剧之家